

自由的失落： 科玄論戰的演變

• 嚴博非

在現實壓力之下的中國式唯科學主義

近代科學技術引進中國的過程，正是中國無法抵擋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侵略而不得不向西方學習的痛苦過程。救亡圖存、自強保種成為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目標。這種情形使得「科學」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具有現實功利性意義。嚴復在《天演論》自序中強調指出：「赫胥黎此書之旨，……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覆三致意焉」。到新文化運動時期，先驅者提出的「科學與人權」這樣一個理性和自由的二元價值結構，至少在早期還是普遍地被人們所接受的。然而這種情形並未能維持多久，到1923年爆發「科玄論戰」時，像胡適這樣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領袖人物，他在論戰中所採取的中國式唯科學主義的態度，則很能表明中國的自由主義在強大的現實壓力下，無法擺脫作為「革命的囚徒」的困境，在很多種情形下，是甘願放棄自身立場，以成全民族富強的夢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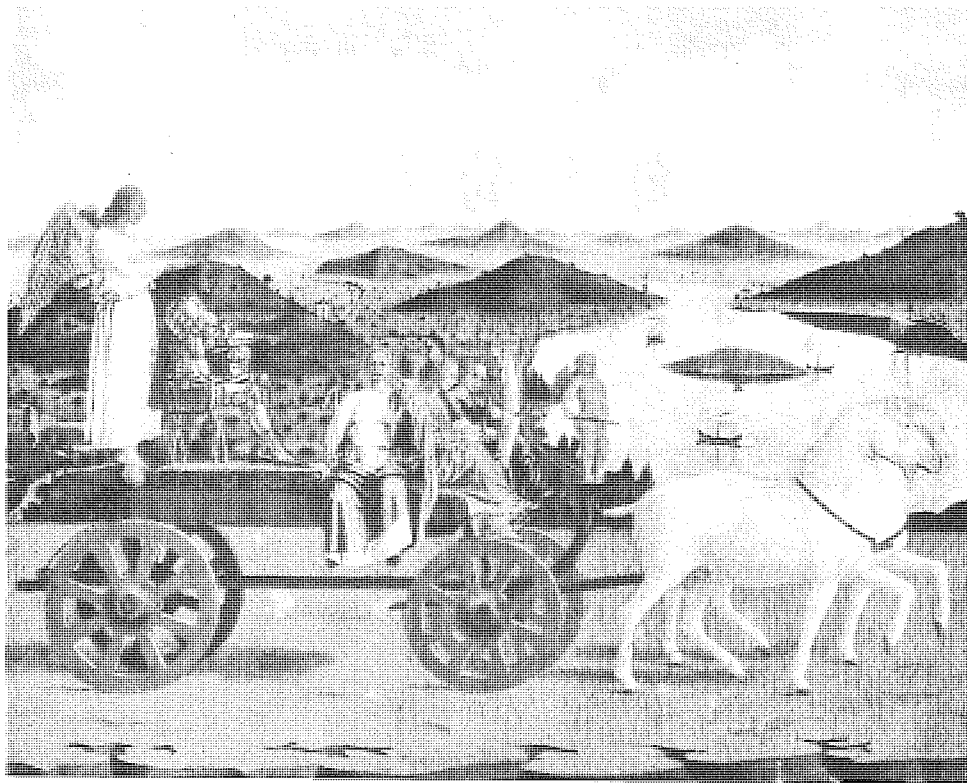
這條唯科學主義的思想路線在論戰中以丁文江、王星拱等一群科學家——吳稚暉、胡適等文化精英——陳獨秀、瞿秋白等共產黨人依次展開。這個次序不僅在時間上恰好是他們登場的先後順序，在絕對化的程度上和在對思想自由的排除上也是逐次上升，愈來愈強，最後以社會歷史的絕對規律達到了中國唯科學主義的體系式終結。

科學家的唯科學主義

相對於這條絕對化的思想路線，丁文江等科學家雖然頗有「科學神」傲視一切的姿態，但事實上卻採取了一種比較溫和、大致是實證主義的科學主義立

救亡圖存、自強保種成為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目標。「科學」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具有現實功利性意義。

唯科學主義的思想路線在絕對化的程度上和在對思想自由的排除上也是逐次上升，愈來愈強，最後以社會歷史的絕對規律達到了中國唯科學主義的體系式終結。



胡適認為科學的聲譽取決於科學先生是否有能力創造出一個包羅萬象的、可靠的、科學的人生觀。

場。丁文江直言不諱以馬赫主義作為他論證科學的基本根據：「我們之所謂物質，不過是感官知覺。假如我們的覺官組織是另一種樣子，我們所謂的物質一定隨之而變」^①，因而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就只是由知覺而「思構」(construct，即日常用的「建構」)的結果，而科學則也就是由思構取得概念，由概念聯想推論而來。物質即是如此，那麼直接得之於人自身的感覺，材料包括人生觀在內的「精神科學」，又何能自外於科學的普遍法則呢？儘管丁文江的「科學」儼然以最高的權威和唯一的準則覆蓋了一切領域，但「思構」之說本身就隱含了科學內部的自由思維，暗含着主體對客體世界的選擇自由。丁文江也遠沒有達到中國唯科學主義在後來形成的那種將科學知識絕對化、凝固化的地步，他所採取的實證主義立場，也使他斷然否認科學真理的終極性：「世界的真理是無窮無盡，我們現在所發現的是不過極少的一部分。科學上所謂公例，是說明我們所觀察事實的方法，若是用於新發現的事實，隨時可以變更。馬赫同皮爾遜(按：即華爾生，Karl Pearson)都不承認科學的公例有必然性，就是這個意思。這是科學同玄學根本不同的地方。玄學家人人都要組織一個牢固不拔的規律系統，人人都把自己的規律當作定論，科學精神絕對與這種規律迷的心理相反。」^②絲毫沒有將科學絕對化、僵硬化的痕迹。任何科學理論都是主觀的自由建構，同時以其演繹命題與觀察事實相對照。假說的形成與經驗事實並無必然聯繫，這些都完全證明了自由是內涵於科學的本質和核心的價值。丁文江在這裏已相當程度地接近了世紀之交科學觀念的深刻變革。其他參戰的科學家也多持有類似的清醒看法。化學家王星拱認為，運用邏輯方法「不能完全靠理性決定，而要憑我們的直覺去選擇」，這就「不是方法所能範圍的了」^③，「總而言之，無論是甚麼理論假定之構造，都有我們的志願」^④。數學家任鴻雋則認為

科學方法的應用「有一定的限度」，「張君所說的人生觀，既就是一個渾沌罔圖的東西，科學方法自然用不上去」^⑤。而胡明復在論戰之前就已經矚目地達到了相當前沿的新科學觀念：「科學的定律與理論完全是在內心中建立起來的，而這些在內心建立起來的定律與理論卻又能與已知的原則和事實系統地聯繫在一起」^⑥。中國的科學家無疑是堅定的「科學派」，他們在捍衛科學的權威時所主張的也大致不出唯科學主義的範圍，但他們對實際科學活動的切身體驗和對當代科學進展的追隨，終使他們對科學的性質和能力始終保持相對謙遜、清醒的認識。

中國的科學家無疑是堅定的「科學派」，他們對實際科學活動的切身體驗和對當代科學進展的追隨，終使他們對科學的性質和能力始終保持相對謙遜、清醒的認識。

文化精英的唯科學主義

然而在當時進步的思想界看來，更能代表科學發言的不是丁文江、胡明復這樣一批科學家，而是吳稚暉、胡適以及後來參戰的陳獨秀、瞿秋白等人。他們通過這場大論戰，將原來還只是綱領性的價值目標，變成了一套超拔於萬事萬物、規約着歷史人生的哲學體系，變成了「為全種萬世而生活」的「最高的宗教」。學理的爭辯消弭於價值優劣的評判之中，論戰迅速地變成了一場充滿激情地確定終極真理的運動。

據胡適的說法，丁文江的發難，唐鉞的響應，二十五萬字的煌煌大文，只是「破題」而已，並未切中要害。真正打着要害開始「起講」的是吳稚暉的〈新信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吳稚暉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如果套用拉美特利「人是機器」的名言的話，那就是「一切都是機器」。吳稚暉毫不費力地通過唯物論達到了這一點。由於一切都可還原為物質運動，而一切物質運動都可像機器一樣被控制操作，所以物質文明的進步就可以導致世界大同的烏托邦。當人所控制的物質運動與日俱增，未來世界完全由變為機器的物質所構成的時候，真善美也就實現了。

然而在當時進步的思想界看來，更能代表科學發言的不是丁文江、胡明復這樣一批科學家，而是吳稚暉、胡適以及後來參戰的陳獨秀、瞿秋白等人。

吳稚暉所建構的「新信仰」至多也是拉美特利、霍爾巴赫的水平。然而從師杜威、宣傳實用主義多年的胡適這時卻拋卻了他一生堅守的實驗主義，對新文化價值的終極確定性要使他面無難色地盛讚這一「新信仰」，而且坦率自陳這正是「純物質純機械的人生觀」，他號召擁護科學的先生們「請準備替他辯護，就像赫肯黎替達爾文辯護一樣」。胡適在論戰中的那篇〈科學與人生觀序〉的著名論文就是以為吳稚暉辯護為己任的。胡適認為，科學的聲譽取決於科學先生是否有能力創造出一個包羅萬象的、可靠的、科學的人生觀。而科學辯護人的責任就是要「冒着危險」去為宇宙及宇宙間萬物、為人作出科學的、合理的解釋，而不是像丁文江那樣撤退到「存疑的唯心論」後面去。因而胡適就繼吳稚暉之後，提出了一個更為宏大的、以科學法則統轄的、包括社會人生在內的宇宙大法，並將其稱之為「建立在二、三百年的科學常識之上的一個大假設」。這個以十條宇宙規律構成的宇宙「因果大法」是一個典型的牛頓模式的絕對世界。「在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裏，天行是有常度的，物變是有自然法則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而在這「因果律的籠罩一切下，『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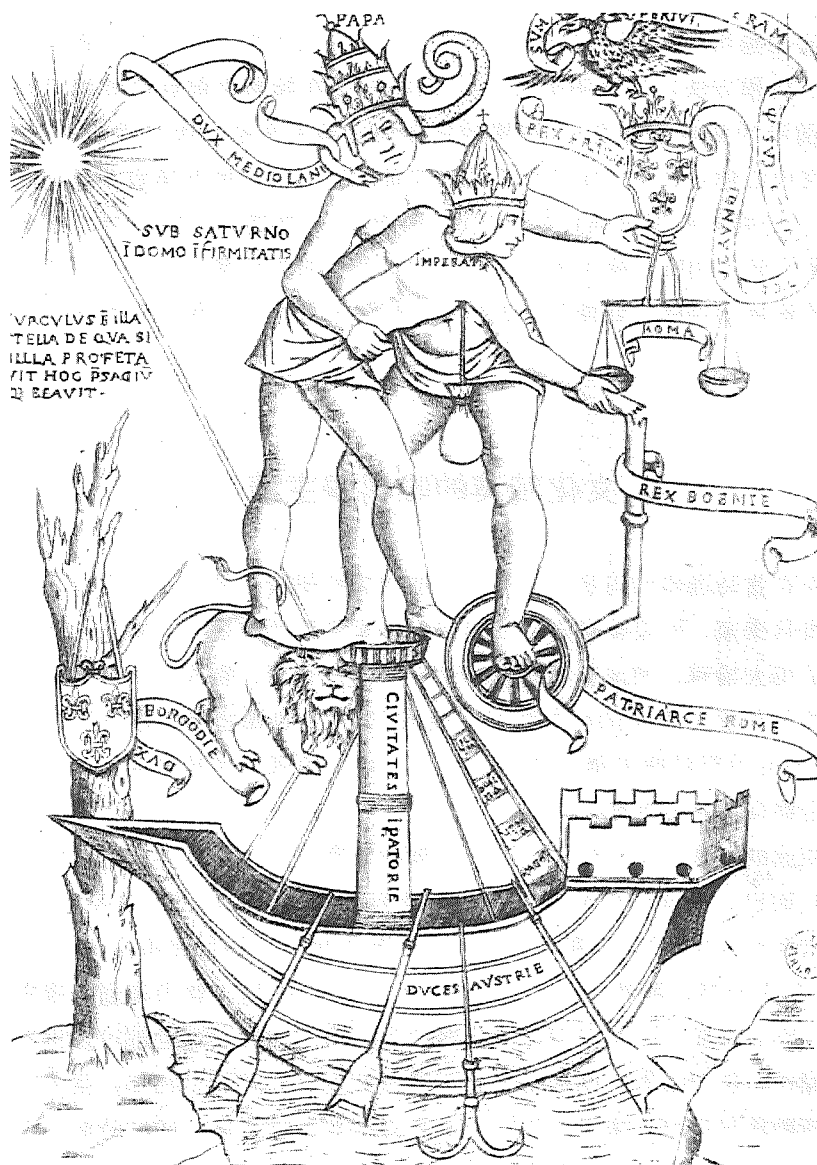


圖 人人都把自己的規律當作定論，科學精神絕對與這種規律迷的心理相反。

胡適繼吳稚暉之後，提出了一個更為宏大的、以科學法則統轄的、包括社會人生在內的宇宙大法。捨棄了他的自由主義立場而變成「為全種(社會)萬世(歷史)而生活」的最高的宗教。

動物的自由就真是很有限了」。豈只是有限，簡直是剝奪殆盡了，然而這並不妨礙自由主義者的胡適為這喪失了自由找到更高的替代物，因為「小我——是要死的，而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胡適終於在此價值判定的當口上，捨棄了(儘管是一度的或在某種情形下的)他的自由主義立場而變成「為全種(社會)萬世(歷史)而生活」的最高的宗教^⑦。科學在中國近代尋求拯救「大我」的價值委身的時候，終於成為一種宗教替代。中國的唯科學主義也由此在社會歷史領域中正式登堂入室，繼剝奪了主體對自然的自由之後，又進一步完全剝奪了人在社會歷史領域中的自由。

共產黨人的唯科學主義

在陳獨秀的「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⑧，和瞿秋白的「社會有定論」：「一切歷史現象都是必然的。

所謂歷史的偶然，僅僅因為人類還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純粹是主觀的^⑩，科玄論戰達到了一種絕對主義意識形態的結局，至此，唯科學主義在中國的特殊形態已被訴諸於一套思想體系了。它不再自列於各種哪怕是一些激進的傳統之中，也不再與其他傳統對話，它超拔於一切思想之上，它所達到的不容置疑的確定性和終極性使它對其他思想只持批駁的態度。

這種絕對主義的意識形態給中國現代的歷史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科學的」這三個字不僅表示它是一種合理性的、正確的行為，而且首先表示它代表真理、代表進步，而真理和進步是代表民族利益、能挽救民族命運的，反對它就等於自甘與人民為敵。現代中國政治文化中的這種科學主義態度極自然地可以把一切學術討論、學理性爭辯合乎邏輯地推向道德批判，而所有學術問題也都能由此還原為道德符號。從而學術進步的每一次機會都成為危險的機會，道德批判的劍始終在頭上懸着。

絕對主義的意識形態給中國現代的歷史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一切學術討論、學理性爭辯合乎邏輯地推向道德批判。從而學術進步的每一次機會都成為危險的機會，道德批判的劍始終在頭上懸着。

註釋

- ①②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
 ③ 王星拱：〈甚麼是科學方法〉，《中國哲學史資料》第一集第六冊（遼寧大學出版社）。
 ④ 王星拱：〈科學方法概論〉，《中國哲學史資料》。
 ⑤ 任鴻雋：〈人生觀的科學和科學的人生觀〉，《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
 ⑥ 胡明復：〈科學方法二〉，《科學》卷2，9期。
 ⑦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
 ⑧⑨ 《新青年》（季刊）2期，1923。

嚴搏非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人員、哲學碩士，曾在《哲學研究》、《文匯報》等報刊上發表論文二十餘篇。

討論摘刊

何佩然（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師） 科玄論戰的開端，應是梁啟超發表《歐遊心影錄》所引起的。針對梁啟超的西方文化沒落論，科學派提倡科學的重要性，有平衡保守思潮的作用，在這個大背景下，說中國的科學主義不懂科學的真義，很可能錯過了事件的歷史意義。

胡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科玄二派根本沒有正面交鋒，科學派是救國心態，玄學派是教授，談的都是學院內的哲學問題。

郭穎頤（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國的科學主義與西方的科學主義有相同的地方，它們在開始時都有替代宗教的意圖，有倫理批判的意味，此現象不獨中國為然。